

中共勝利的基幹隊伍： 延安一代知識份子

• 裴毅然

一 延安的重要性

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形式正式形成於延安時期(1935-1948)。蔣介石貼心侍從、特工頭目唐縱在日記中談及延安對中共的重要性，以及中共對知識份子與私有財產政策的轉變^①：

毛澤東經過土地革命之教訓，與封建勢力鬥爭的經驗，知道國民革命走的道路是正確的，中國革命的主力不是工人，而是小資產階級和農民，故自民國三十一年整風運動以來，竭力爭取中間層知識份子。在第七次大會毛澤東的政治報告，主張保持私有財產制度並發展資本主義，這是中共一個很大的轉變。這一轉變在中國收得很大的效果，後方許多工商界和國民黨內部失意份子，過去對於共產黨恐怖的心理，已完全改觀。

中共延安時期政策的轉緩，使中共獲得人和。延安一代知識份子的崛起是中共勝利最關鍵的「客觀保證」。顯然，中共僅憑南方長征而來的二萬餘紅軍，在抗戰結束後不可能具備與國民黨爭鋒逐鹿的能力。

來自敵方的總結一般比較深刻。唐縱指出中共對知識份子及私有財產政策轉變的巨效，可謂撥草見物一語中的，點到中共獲勝要因之一。

延安時期，革命手段無限制、道義原則工具化的極左傾向得到遏制。南方蘇區劫富濟貧的平均主義，短期內雖能有效動員一部分農民「入夥」造反，但這種只破壞不建設的暴烈政策畢竟缺乏持續性。1929年2月，湘贛邊蘇區幹部就指出：「大破壞之後，沒有注意到建設問題，沒有注意到經濟恐慌的危機，以致造成鄉村全部的破產，日益激烈的崩潰。」^②蘇區經濟必須依靠高歌凱進的軍事擴張才能維持，與黃巢、李自成的流寇主義大致相同。一旦擴張停止，僅靠赤區經濟體系，便無法維持。一位中央蘇區財政人員說：「城市商業日漸衰落，最後陷於停頓。營業稅的收入也很少了。此外，其他收入則為數更少。」^③

相對於南方蘇區搞得雞飛狗跳、缺乏持續性的「打土豪經濟」，中共延安時期各項政策要寬緩得多。「減租減息」而非徹底剝奪地富，使得延安經濟較之江西有了更多的推進力；「三三制」更是擴大了政治基礎，因此得到知識份子的政治支持。畢竟，地方鄉紳既是生產的組織管理者，也是維持社會再生產的基本

社會力量。惡霸劣紳終究是極少數。「劫富濟貧」打掉了所有鄉紳，也就一併摧毀了該地的生產力。

政策的轉緩，使中共獲得人和。延安一代知識份子的崛起是中共勝利最關鍵的「客觀保證」。「延安一代」包括抗戰前後進入各根據地的青年知識份子。顯然，中共僅憑南方長征而來的二萬餘紅軍，在抗戰結束後不可能具備與國民黨爭鋒逐鹿的能力。從隊伍構成上，僅有山上隊伍的「槍杆子」，缺乏來自亭子間的「筆杆子」，也是無法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抗戰第一年，八路軍就從3萬餘擴至25萬^④。1944年年底，國民黨擁軍200餘萬，中共63萬^⑤；半年後中共七大，中共黨員120萬，軍隊近91萬，初具對抗實力了^⑥。

1938年3月3日，毛澤東向陝北公學（陝公）畢業生致臨別贈言，作出歷史性預示：「從前有個黃埔，那裏表現着一種朝氣，這種朝氣也就代表着一種傾向。黃埔和陝公一樣，同學是從各地方來的，又分布到各地方去。」^⑦對於大批青年知識份子的加盟，毛澤東的政治敏感十分強烈。1942年5月28日，延安文藝座談會剛結束，毛澤東在中央學習會上作報告^⑧：

需要像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一樣，天天講，使得在軍事、政府、黨務、經濟、教育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對文化人、知識份子採取歡迎的態度，懂得他們的重要性，沒有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斯大林在聯共第18次大會上把這個問題當作一個理論問題來講的。任何一個階級都要用這樣的一批文化人來做事情。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都是一樣，要有為他們使用的知識份子。

隨着中共軍政影響日益擴展，延安一代知識份子對1940年代以後的中國歷史走向發生了無法漠視的作用。十六歲到延安的何方晚年說：「後來看到所發生的各種事情會經常聯想到延安整風，越來越感到那場運動對黨和國家影響之長久和巨大。」^⑨延安文化模式規範了幾代人的思想，塑造了幾代人的價值。

1949年以後，在思想、文化、教育等領域，「延安出身」成為進入新政權上流社會的入門券。文化界、思想界沒有這一出身的昔日主角均退居邊緣，延安一代一統天下。直至1980年代，中共黨內都將延安時期視為「黃金時代」，把延安一代稱為「黃金一代」^⑩。

從思想傾向、價值理念這一大框架上來考察，就連自由知識份子胡風、賈植芳也屬於延安一代。他們雖然沒有到過延安與根據地，沒有加入中共組織，但在價值認同與思維方式上，完全接受「延安模式」。胡風與周揚的文藝理論雖有不同，但文藝為政治服務則是他們的共同歸宿，分歧僅在於如何具體為政治服務。兩人的對立僅僅源於當時極不寬容的社會氛圍，並沒有實質性的價值對抗。《小兵張嘎》作者徐光耀晚年說：「那時候，人們的思想能有幾個不『左』呢？……甚至包括胡風，跟黨也是跟得很緊的。」^⑪胡風等人在1955年下獄後，也只能發出模糊的迷惘之嘆，無法進行深入反思。

1955年成立的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共六十一人，成員主體即為延安知識份子，尤以中央研究院為核心：陳伯達、胡喬木、周揚、艾思奇、胡繩、范文瀾、尹達、張如心等。其他進入學部的延安知識份子還有：何其芳、于光遠、王學文、楊獻珍、鄧拓、薛暮橋、吳玉章、向達、潘梓年、駱耕漠等。

在1949年以後，於思想、文化、教育等領域，「延安出身」成為進入新政權上流社會的入門券。至1980年代，中共黨內都將延安時期視為「黃金時代」，把延安一代稱為「黃金一代」。

延安發生的一切均意味深長，裹帶着重要的歷史內涵。近年，將「延安知識份子」單獨列類，已成為中國現代史學界基本術語，愈來愈受到中外學者垂注。

二 廣招天下士

1937至1938年，中共打開大門「廣招天下士，誠納四海人」（中組部長陳雲語）^②，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抗大）登報招生。1937年9月5日，陝公校長成仿吾在《新中華報》上發表〈陝北公學招生簡章〉，西安、三原、延安等地設立考場。1937至1942年，中共在延安先後創辦抗大、陝公、魯迅藝術學院（魯藝）、中國女子大學等十七所院校，面向全國招生。1937年，中共特調上海的艾思奇、何干之到陝公任教。陳雲強調：「誰搶到了知識份子，誰就搶到了天下。」^③「現在各方面都在搶知識份子，國民黨在搶，我們也要搶，搶得慢就沒有了。」^④南京、武漢、西安、重慶、太原、桂林、蘭州、迪化等地的八路軍辦事處以及廣州的八路軍通訊處，千方百計將知識青年一批批送往延安。延安所有教育都是免費的，抗大須為每位學生平均支付10.5元^⑤。

大批知識青年原本就不滿國民黨的消極抗戰和專制統治，再受斯諾的《西行漫記》、范長江的《中國的西北角》，以及其他介紹延安的文章強烈吸引，遂懷着信仰憧憬從天南海北投奔延安。

另一方面，「九·一八」以來，大批知識青年原本就不滿國民黨的對日妥協和專制統治，再受斯諾（Edgar Snow）的《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范長江的通訊《中國的西北角》、《塞上行》，加上其他介紹延安的文章的強烈吸引，懷着信仰憧憬從天南海北投奔延安。1938年夏秋達到高潮，每天都有百八十人到達延安，夫婦同行，姐妹相攜，還包括一位七十五歲的老頭。抗大招生額滿，從延安到西安的電線杆都貼上「抗大停止招生」，但「還是有許多青年徒步走來」^⑥。

著名音樂家冼星海1937年9月首次聽到延安這一地名，1938年3月4日他在日記中寫道^⑦：

今天悶得很，把《抗戰中的延安》讀過一次就感到很興奮。看他們一班革命青年在節衣縮食去幹革命工作，不斷尋求真理和民族的解放！我們雖然在後方，可是比起他們就覺得慚愧得多！我怕自己會漸漸落後而大不前進。中國現在是成了兩個世界，一個是向着墮落處下沉，而另一個就是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進。延安就是新中國的發揚地。

11月3日，冼星海一家抵達延安。延安青年李銳晚年說^⑧：

那個時候讀的進步書籍影響最大的就是《西行漫記》。完全是從救亡思想出發，要亡國了，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那時其實沒有多少馬克思的書可讀，主要讀左翼的書。馬克思的書武大圖書館有，但那是英文版的。毛澤東的書根本就沒讀過，哪裏有啊？

1939年末以後，赴延青年人數才急劇減少。據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統計，1938年，萬餘青年從該處獲准前往延安。同年，延安抗大學員突破一萬、陝公

3,000、青訓班2,000，加上魯藝、馬列學院、黨校，共約二萬人^⑩。另有更精確的數據：抗大學員最多時達13,390人^⑪。1937年7月至1939年6月，共有15,000餘名各地青年進入抗大。「史前穴居般小城」(韓素音語)——中共初到時只有2,000餘人的延安^⑫，雖然狹小骯髒(尤其廁所極其原始)，卻頓時成為一座充滿朝氣的青年城市。「走在延安街上，自南至北，一條短短的大街，擠着無數的人，同了無數不同的面貌，不同的口音。延安是這樣的擠滿了人，簡直是水洩不通。」^⑬斯諾夫人威爾斯(Nym Wales)的形容是：「胳膊碰胳膊的世界」、「延安的空間肯定要比華爾街的寶貴多了」^⑭。1942年整風時，延安總人口達四萬，「三萬黨政軍，一萬老百姓。」^⑮

1937至1947年成為中共歷史上發展最快的一個時期，黨員人數由區區幾萬猛增至270萬。1962年1月3日，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提及：「經過長征，30萬人縮小到2萬多人，到陝北以後補充了一點，還不到3萬人。」^⑯另有數據表明：1937年中共擁有4萬黨員，1945年120萬，1948年300萬，1949年450萬(全國總人口的1%)^⑰。雖然其中以工農黨員佔多數，但在各級黨組織起核心作用的則是來自寶塔山下的延安知青，組成40萬人的幹部隊伍^⑱。前清舉人黃炎培在訪問延安日記中寫道：「集中這一大群有才有能的文人武人，來整理這一片不小也不算大的地方，當然會有良好的貢獻。」^⑲

延安之所以能夠吸引一代青年精英，除了抗戰這一強力劑之外，還有更深層次的時代思潮的推動力量，即「紅色的三十年代」這一時代大背景。屬於延安一代的趙紫陽晚年回憶：「在資本主義大危機的三十年代，共產主義是很時髦的，知識份子是很嚮往的，共產主義是很吃香的。」^⑳外國史學家也說：「許多中國學生、大量學者，這個國家最有威望和文學才華的人，比如魯迅，都逐漸左傾。」^㉑

從價值根源上看，國民黨政府對日政策的軟弱，映襯了中共激進民族主義的吸引力；以消除一切貧富差異與社會弊端為旗幟的社會主義更具有強大的道德號召力。正如青年毛澤東曾說：「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趨赴。」^㉒無形的精神遠比有形的物質更具凝聚力。至於「革命後」可能出現的負面之弊，則因其相對遙遠而模糊朦朧；更何況革命青年被改天換地的理想所燃燒，哪裏具備看清「革命後」的前瞻能力？

三 學歷與構成

1943年12月，任弼時在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通報：「抗戰後到延安的知識份子總共4萬餘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71% (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1%，初中31%)，初中以下約30%。」^㉓推算可知，高中以上程度的知識份子約為8,000人，1944年春毛澤東所說的「延安的六七千知識份子」^㉔，指的便是這批高中以上赴延的知識份子。這一批人後來成為1950至1970年代中國知識界的主導群體。

中外史學界都認為知識份子的走向預示着十至二十年的社會未來；而一個政權拋棄知識份子，則是一次大革命的先兆^㉕。以抗戰初期知識份子流向來看，截至1943年，國民黨一百幾十萬黨員，學生黨員僅約三萬^㉖，顯然未能搶過共產黨。

延安之所以能夠吸引一代青年精英，還因為「紅色的三十年代」這一時代大背景。國民黨政府對日政策的軟弱，映襯了中共激進民族主義的吸引力；以消除一切貧富差異與社會弊端為旗幟的社會主義更具有強大的道德號召力。

延安知青主要以中學生為主，大學生甚少。他們到達延安後，無論政治理論思想的準備，還是實際工作能力，均須進入學校接受「再教育」。他們熱衷軍政、藝術，急於直接作為於社會，對隔着一層的學術和技術興趣不大。

據不完全統計，延安知識份子代表人物進入延安前的學歷如下：

留學生：王學文(留日)、葉以群(留日)、何干之(留日)、周揚(留日)、艾思奇(留日)；陳伯達(留蘇)、師哲(留蘇)；楊秀峰(留法)、艾青(留法)、陳學昭(留法)；喬冠華(留德)、江隆基(留德)、章文晉(留德)；高士其(留美)。

大學生：范文瀾(北平女子師範大學校長)、丁玲、吳伯簫、王實味、林淡秋、齊燕銘、卞之琳、張庚、胡喬木、鄧拓、何其芳、王汝琪、蔣南翔、黃華、周而復、任仲夷、歐陽山尊、于光遠、楊西光、鄧力群、田間、陳傳綱、李銳、胡繩、高原、朱穆之、顧準、劉祖春。其中著名女性有：龔澎、嚴慰冰、浦安修、韋君宜、蘇靈揚。1945年以後到達的大學生有：李慎之、王光美。

專科生：楊獻珍、王朝聞、錢俊瑞、李莊、袁庚、吳南生、芮杏文、惲逸群、彭柏山、崔月犁、陳叔亮、塞克、孔厥、胡考、賀綠汀、劉大年、吳印咸。

高中生：趙紫陽、萬里、張勁夫、安志文、吳南生、項南、吳德、廖蓋隆、廖沫沙、彭沖、吳冷西、田家英、馮牧、沙汀、陳荒煤、徐懋庸、郭小川、蕭軍、柳青、趙樹理、秦兆陽、劉賓雁、張春橋、王力、江青、葉群、戈揚。

初中生：華國鋒、谷牧、方毅、紀登奎、田紀雲、許家屯、王任重、王丙乾、錢其琛、關鋒、穆青、舒群、陳企霞、王若望、凌雲、馬天水、聶元梓。

從學歷構成上看，延安知青主要以中學生為主，大學生甚少，碩士、博士更是鳳毛麟角。因此，他們到達延安後，無論政治理論思想的準備，還是實際工作能力，均須進入學校接受「再教育」。他們在擇校時流行如下的排序：「不進抗大，就進陝公；不進陝公，就進魯藝；不學軍事，就學政治，不學政治，就學文學。」^⑥「在這裏，政治高於一切，許多男女青年都歡喜學政治。」^⑦從擇業方向可以看出延安知青熱衷軍政、藝術，急於直接作為於社會，對隔着一層的學術和技術興趣不大。

毛澤東也說：「在延安，首長才吃得開，許多科學家、文學家都被人看不起。」^⑧「多數甚至全部知識份子奔赴延安，都是為了學些革命道理很快到抗日前線上去用。……那時需要動員的不是上前線，而是留在後方工作。」^⑨所以有毛澤東的名言：「你們要下決心，在抗大工作四十年，死了就埋在清涼山。」^⑩截至1942年整風前，抗大總校與分校走出10萬畢業生，90%上了前線，「沒有多少人願意留在後方搞學院式研究或讀書。」^⑪由此不難看出延安青年急於求成的短視與躁躁然急於「起而行之」的心態。

陳學昭《延安訪問記》記載：「有些政治工作者，好似不十分看得起技術人員，再則自己以為自己是政治工作人員，政治問題再沒有人能比得上他那樣認識清楚的。在他看起來，科學的技術人員不過像一個木匠，或手工業者」，「外面來的醫生，就是技術好也沒有用處，因為他們不認清政治，不懂得政治，要動搖。」^⑫在延安，「有些工作特別能迅速地得到人們的認識，哪幾種呢？會說話、會唱、會演戲，末了，恐怕要算就是會寫。說這裏是文化人的天堂，一點也不算過份。若以他們所享受的榮譽來比技術人員，技術人員當然是趕不上的。」^⑬

據1941年5月出版的《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簡史》記載，該校學生的階級出身絕大多數為小資產階級，也有一些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子弟，包括各黨各派成員。職業來源則幾乎涵蓋所有行業。文化程度從文盲到留學生，年齡介乎

於十三至五十歲之間，有全家入校、母女同隊、叔侄同學。還有來自南洋、菲律賓、印尼、越南、柬埔寨、南北美洲的華僑青年46人^④。

赴延知青高中以上學歷者大多出身殷實中產階層。如國會議員之子李銳、河南潢川縣城舉人之子王實味、書香之女陳學昭；貧寒子弟則有冼星海。貧寒家庭難出高中生，加上赴延所需路費不薄，卡住了貧寒子弟的赴延腳步。

從現實條件上看，1930年代國民黨執政後着力推廣的地方師範教育，乃是中共之所以能夠得到一代精英的第一級推進器^⑤。延安一代知青大多出生於1910至1920年代，正好趕上國民黨執政後鼓勵發展地方師範學校，相當一部分貧家子弟得以接受幾乎免費的初中教育。1922年，十五歲的宜興貧家子弟徐鑄成入無錫省立三師，「師範不收學費，膳宿費也全免。除預科第一學期要繳納校服三十元外，以後每學期開學前，我只向母親要零用錢五元。」^⑥師範生對社會的回報是畢業後必須擔任兩年小學教員。免費師範大大拓展了中國小知識份子群體人數。同時，隨着地方師範發展，師資自必出現短缺，因此這些學校收留了大革命後流亡到邊遠鄉鎮的中共黨員與左翼人士，再將一大批不滿現狀的城鄉知青培養成中共基層幹部，成為中共發展壯大不可或缺的社會基礎，並進而動員下層民眾參與其事^⑦。

1930年代以前，中國知識份子人數稀少，若非國民黨執政後着力推廣地方師範教育，便不可能為中共提供如此數量的中小知識份子。可以說，國民黨的地方師範教育打下最基礎的初級培訓，免費為中共輸送發展壯大所亟需的大量基層幹部。這些師範生到達延安後，經過「熱炒熱賣」式短期培訓，很快進入中共幹部隊伍。否則，要將眾多文盲培訓成能夠使用的幹部，僅靠短期培訓，無論如何是辦不到的。「整個抗戰時期，延安各類學校採用這種『熱炒熱賣』方針訓練的幹部，共有20萬人。其中，僅抗大總部和各分校就先後訓練了10萬幹部。」^⑧

國民黨的地方師範教育打下最基礎的初級培訓，免費為中共輸送發展壯大所亟需的大量基層幹部。這些師範生到達延安後，經過「熱炒熱賣」式短期培訓，很快進入中共幹部隊伍。

四 代際作用

應該承認，聚集延安的知識份子作用非凡。這一批人到來後，「一個新的社會組織秩序和價值意義系統形成並運轉起來了」^⑨。2001年，李慎之說：「今年70歲到90歲這個年齡段的知識份子（當時都叫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這批人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最主要的骨幹。中國共產黨所以能打敗國民黨，建立新中國，贏得相當民心，取得若干成就，這一年齡段的人的功勞是主要的。」^⑩

當然，延安一代知識份子當時尚年輕，處於黨內中層，起着執行與貫徹的作用，還未上升到決策層。革命的領導者均來自江西蘇區與留蘇的中年知識份子。這一政治格局一直延續到文革後。延安知青乃是中共黨內的第二代，屬於「行動的一代」。延安知青何方晚年說：「無論是建國前還是建國後，『三八式』一代只起了中下層的骨幹作用，上層領導還是用經過長征的工農老幹部。」^⑪1953年夏，毛澤東在一次與大區負責人的講話中提到：「中級幹部北方人多，高級幹部南方人多，是歷史形成的。這是因為在早期南方革命運動發展較為普遍，後來革命運動轉到北方來了。」^⑫1962年初，毛澤東又說：「1930年以前入黨的，20年代入黨的，據前幾年計算，有800多人，這兩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700多人了。」^⑬

這700餘人基本都在中央，均為各重要部門領導，多為南方人。文革前，延安一代尚處候補的第二、第三梯隊。

延安時期，少數精英陸續進入高層核心，參贊樞要，成為中共各要角秘書，躋身「梯隊」。先後進入政壇高層的「青年學士」集團成員：毛澤東秘書周小舟（湖南省委第一書記）、陳伯達（中常委）、胡喬木（政治局委員）、田家英（中辦副主任）、吳冷西（新華社長兼《人民日報》總編）；朱德秘書黃華（副總理、外長）、廖蓋隆（新華社副總編）；高崗、陳雲秘書李銳（中組部副部長）；劉少奇秘書鄧力群（政治局委員、中宣部長）；周恩來秘書宋平（中常委）；王明秘書廖魯言（農業部長）；博古秘書劉祖春（中宣部常務副部長）；任弼時秘書師哲（山東省委書記處書記）；王稼祥秘書陶鑄（中常委）；陳雲秘書姚依林（中常委）、王鶴壽（中紀委書記）、周太和（國家體改委副主任）；康生秘書匡亞明（南京大學校長）；高崗秘書馬洪（國務院副秘書長）；林伯渠秘書區棠亮（中聯部副部長）……

1950年代嶄露頭角的延安一代：楊秀峰（最高法院院長）、曾濤（最高法院院長）、王任重（湖北省委第一書記）、蔣南翔（高教部長）、周揚（中宣部副部長）、吳冷西（中宣部副部長）、林默涵（中宣部副部長）、鄧拓（《人民日報》總編）、范長江（《人民日報》社長）、許立群（馬恩編譯局長）、孫冶方（國家統計局副局長）、成仿吾（人大校長）、江隆基（北大書記）、艾思奇（人大副校長）、陳虞孫（《文匯報》總編）……

文革時期，延安一代已進入政治局：華國鋒（中央主席兼總理）、紀登奎（副總理）、張春橋（中常委、副總理）、吳德（北京市委書記）、江青（政治局委員）、葉群（政治局委員）；進入部長一級：喬冠華（外長）、何東昌（教育部長）、錢正英（水電部長）、熊復（新華社長、《紅旗》總編）。名噪一時的有：王力（中央文革成員、《紅旗》副總編）、關鋒（中央文革成員）……

文革後，1981年中組部統計3,900萬黨員，1949年10月前入黨僅6.8%^④，多已升入中高層。1982年十二大後，趙紫陽、萬里、胡喬木、姚依林、方毅、喬石、田紀雲、吳學謙等「一二·九」一代進入政治局；李銳、蔣南翔、谷牧、王丙乾、胡繩、崔月犁、楊靜仁、芮杏文、閻明復、鄧力群、許家屯、朱穆之、朱厚澤、穆青、賀敬之進入中委，拉開架勢，準備全面接班。1987年十三大，正式整體接班，粵閩瓊等各省首長亦多出延安一代：任仲夷（廣東省委書記）、項南（福建省委書記）、吳南生（海南省委書記）、梁湘（海南省長）、高揚（河北省委書記）、池必卿（貴州省委書記）……此外，還有于光遠（社科院副院長）、胡績偉（《人民日報》社長）、曾濤（新華社社長）、李普（新華社副社長）、曾彥修（人民出版社社長）、劉順元（中紀委副書記）……

從整體上，學歷較高者還是升遷較快，職位較高。儘管中共理論上打壓知識份子，但實際需要還是使中共至少建政前只能使用「能夠成事」的知識份子幹部。

五 局限與悲劇

延安一代的局限也很有代際特徵。出自地方師範的學生大多來自中等以下的小農家庭，基礎知識原本就淺薄浮表，延安各類學校又都倉促開辦，書籍資

小知識份子半懂不懂地接受馬列主義，青春激情又使他們無比高昂地認定「事業」的崇高性，從而將馬列教條絕對化，形成最堅決的革命力量。他們後來成為中共政權的基層細胞也是「小知識份子管理大知識份子」的社會基礎。

料與師資力量極度匱乏^⑤。他們能夠讀到的書除了《共產黨宣言》、《聯共黨史》，便只有列寧的《論「左派幼稚病」》、《帝國主義論》，以及艾思奇的《大眾哲學》。陳伯達的幾本小冊子，《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內戰時期的反革命與革命》、《關於十年內戰》、《評「中國之命運」》、《中國四大家族》，非常流行。李銳回憶說：「他（陳伯達）的書是當時解釋社會主義、毛澤東思想、馬克思主義最好的書。」^⑥直到文革，李銳所知道的社會民主黨也就局限於李卜克內西（Karl Liebknecht）與盧森堡（Rosa Luxemburg）的一點常識^⑦。各部隊與根據地還出現扣書籍、搶教員的事。1939年，鄧小平帶了兩位馬列學院教員去前方，半途被扣，打了半年官司，八路軍總部才派人換出兩名教員。延安給山東送去一二百本《聯共黨史》，山東只收到七本^⑧。

當時延安各校多為短期培訓班，最正規的抗大第1至6期亦僅八個月左右^⑨，陝公普通隊「學習期限一般只有三個月」^⑩，所授課程亦為馬列基礎理論與軍政技能，不可能進行正規系統的授課^⑪。這批小知識份子半懂不懂地接受馬列主義，淺薄的知識基礎使他們不可能進行任何有質量的比較鑒別，只能無比堅定地接受灌輸給他們的學說，青春激情又使他們無比高昂地認定「事業」的崇高性，從而將馬列教條絕對化，形成最堅決的革命力量。這批小知識份子後來成為中共政權的基層細胞，也是「小知識份子管理大知識份子」的社會基礎。

「黨內第一理論家」陳伯達也承認絕大部分延安知青不可能對馬列原典進行系統研習：「我曾經讀過多種政治經濟學書，就是沒有對《資本論》進行認真的研讀，因為《資本論》卷帙很厚……認真讀《資本論》還是在解放以後。」^⑫周揚也是在文革近九年的牢獄中精讀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⑬。陳雲在文革下放江西的三年裏通讀《列寧選集》^⑭。1948年參軍的白樺說：「許多年輕人都自願冒着生命的危險走到我們中間來，就如飢如渴、生吞活剝地閱讀馬列主義書籍，就以天下為己任，激昂慷慨，奔走呼號。」^⑮

日後成為「紅色理論家」與「紅色作家」的人，大多是來延安之前就已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學生或大學教授。范文瀾1940年1月到延安時，已經四十七歲。他畢業於北京大學，曾任蔡元培秘書，長期在北大、北師大、南開大學、河南大學等校執教。周揚畢業於上海大夏大學，曾留學日本。陳伯達先後就學於集美師範、上海大學、莫斯科中山大學。胡喬木入清華大學一年，入浙江大學兩年。艾思奇畢業於雲南省立一中，是留日生。于光遠畢業於清華物理系。楊獻珍畢業於武昌國立商校。稍稍有點成就的也是那些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如陳學昭為留法的文學博士，丁玲進過上海大學。

對大批中小延安知識份子來說，既然搞思想搞研究不行，便去搞文學，一時間竟出了大大小小二百多個詩人。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是：延安知識份子幾無一人後來從仕途真正折轉學界。即便有一點學術成果，亦大多經受不住歷史檢驗。從層次上說，無一人達到所在領域的最高層，無一人成為引領風騷的一代宗師。1931年參加安陽殷墟發掘的尹達，儘管後來身列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歷史研究所第一副所長，到底沒再出甚麼像樣的學術成果。後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的趙復三，八十歲仍缺乏學術第一的價值認同，發言撰文之前首先自問「有用無用？」^⑯政治第一的思維定勢十分豁顯。何方如此評說延安一代^⑰：

延安知識份子幾無一人後來從仕途真正折轉學界。即便有一點學術成果，亦大多經受不住歷史檢驗。從層次上說，無一人達到所在領域的最高層，無一人成為引領風騷的一代宗師。

正像「抗大校歌」中唱的，他們是「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擔負着民族解放的重任。按道理，在他們中間一定會產生一批政治家、軍事家以及大師級的專家學者（連沒有奔赴解放區的知識份子中都出現了一批堪稱大師級科學和文史方面的著名人才），可惜結果並不理想。這除了那個時代的客觀環境外，輕視知識的知識份子的傳統與政策也是重要原因。思想改造和思想管制限制了知識份子幹部在科學、文藝和學術諸方面的創作和成就，而不讓他們進入省級以上領導，特別是中央決策層，就使他們對黨的建設和社會發展無從發揮應有的重要作用。……

延安整風形成的這種思想管理體制，很難在哲學社會科學和文學藝術的各領域培養出公認的大師級的專家學者來，即使原有的大師級人物也很難拿出大師級的作品。這曾使一些著名的學者和作家抱憾終生。他們想研究的問題不能研究，想寫的東西不能寫，想出版的書不能出，想演的戲不能演，哪裏有過甚麼「雙百方針」，只是口頭上說說而已！

延安一代學歷低淺造成的知識結構殘缺，不僅沒有使他們低首下心迎頭趕上，輕視書本知識的延安風氣反而使他們得到傲視大知識份子的資本，認為自己少受資產階級思想污染。

延安經歷使這一代知識份子擁有天然優越感。他們一生熱情澎湃、工作積極，終身忙忙碌碌，積極批評別人，很少自我休整、自我補充，活得好積極、好辛苦，自以為能夠開創出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尤其1950年代後，延安一代漸漸接近權力中樞，屬於「少年得志」，個個政治熱情高漲，挾熱情以遨遊，抱政治而長終。1963年11月，早已失勢的李銳與田家英見了一面，回來後李銳吟詩：「關懷莫過朝中事，袖手難為壁上觀。」^⑥同時，「為了未來犧牲今天」為延安一代披上了金光閃閃的道德光環，使他們認為無論從思想上還是從道義上，都有資格要求他人為了「長遠利益」也作出個人犧牲，以未來的名義要求人們自覺放棄現實利益。

對本身就偏傾偏側的馬列學說而言，其最佳接受者與匹配者，恰恰正是這些小知識份子。半瓶水晃悠的粗淺知識，使小知識份子剛好能夠半懂不懂、自以為是地接受馬列教條，同時又無能力思考更深層次的現象與理論問題。因此，青春使延安一代熱切地希望改變「萬惡的舊社會」；淺薄使他們能夠狂熱崇拜「導師」；小知使他們堅信「革命真理」。

學歷低淺造成的知識結構殘缺，不僅沒有使他們低首下心迎頭趕上，輕視書本知識的延安風氣反而使他們得到傲視大知識份子的資本，認為自己少受資產階級思想污染。學歷低淺者猶如貧賤者，容易揣上一夜暴富的心理：既然學術上、知識上先天不足無法抗爭，便只有走政治快捷途徑了。

受時代局限，延安一代還認識不到求新之日即易錯之時，他們將走向「新生活」看得太容易、太當然，思想框架內根本沒有自檢自省這根弦。他們一方面徹底否定現狀，一方面對未來極度樂觀，認為革命將會帶來所要的一切。他們以火熱的革命激情不允許他人進行任何質疑，對反面意見予以彈壓，不知不覺地完成了由造反者至壓制者的「自然」轉換。根據認識心理，極度自信與過份樂觀必然伴隨對反面論據的故意忽略，以自己之是為必是，認定自己的觀點乃是毋庸置疑的終極真理，不容任何不同意見的商榷與質疑，成為文化暴力的溫牀。歷史悲劇大多可溯源於文化，尤其持續性的悲劇必然發軔於文化，現實中的暴力歸根結底源自認識上的偏狹。

「老延安」李銳晚年終於認識到一開始就南轅北轍走錯了路^⑩：

毛澤東們選擇的「俄國人的路」，幫助中共黨人經過共產革命，取得了執政地位，但是終究沒有「根本解決」中國的問題。豈止是沒有「根本解決」問題，簡直就是同人類文明背道而馳，遲滯了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進程……運動不已，生靈塗炭，幾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上億人受到牽連，上演了一幕幕愈演愈烈的人間悲劇，使得國家、民族和社會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遲滯了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進程……甚而至於發生「六四風波」，動用軍隊彈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導致了中國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場悲劇，所有這些，反思起來，都要從上個世紀「走俄國人的路」追根溯源。

註釋

- ① 公安部檔案館編註：《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北京：群眾出版社，1991），頁522。
- ② 〈楊克敏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25日），載江西省檔案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頁19。
- ③ 曹菊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工作的部分情況〉，載陳毅、蕭華等：《回憶中央蘇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頁373。
- ④ 彭德懷：《彭德懷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頁227-29。
- ⑤⑩⑬⑭ 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354、373；279；251；279。
- ⑥ 朱德：〈論解放區戰場〉（1945年4月25日），載《朱德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149。
- ⑦⑧⑨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104；432；374。
- ⑪⑫⑬⑭ 何方：《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上冊（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頁209；279；129；259-60、266。
- ⑮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冊（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頁495。
- ⑯ 邢小群：《丁玲與文學研究所的興衰》（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頁162。
- ⑰⑱⑲ 劉家棟：〈陳雲與延安知識份子政策〉，參見朱鴻召編選：《眾說紛紜話延安》（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頁82；84；90。
- ⑳ 轉引自劉家棟：《陳雲在延安》（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頁30。
- ㉑ 陳雲：《陳雲文選（1926-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115。
- ㉒ 江文漢著，黃天霞譯：〈1939年江文漢延安訪問記〉（1939年11月17日），《檔案與史學》，1998年第4期，頁6。
- ㉓ 陳雲：〈論幹部政策〉（1938年9月在抗大的講演），載《陳雲文選》，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113；何其芳：〈我歌唱延安〉，《文藝戰線》，創刊號，1939年2月。參見《眾說紛紜話延安》，頁222。
- ㉔ 紫卉：〈《黃河大合唱》的兩部手稿檔案〉，《檔案春秋》，2006年第9期，頁2。
- ㉕⑳㉖ 笑蜀：〈「總起來看我還是比較樂觀的」——李銳談社會主義與中國〉，《炎黃春秋》，2007年第2期，頁10；11；12。
- ㉗ 逢先知主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頁99。
- ㉘ 葉尚志：〈培養革命軍政幹部的搖籃〉，《世紀》，2006年第4期，頁52。
- ㉙㉚ 黃炎培：〈延安五日記〉（1945年7月），參見《眾說紛紜話延安》，頁384；397。
- ㉛⑳㉜㉝㉞ 陳學昭：《延安訪問記》（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頁6；77；95；96、98-99；86。

- ②③ 威爾斯(Nym Wales)著，陶宜、徐復譯：《續西行漫記》(北京：三聯書店，1991)，頁79。
- ②④⑤ 轉引自何方：《黨史筆記》，上冊，頁374，註釋85；頁279。
- ②⑤⑥ 《學習資料》(內部材料)，頁1；2。該書無編纂者、無編印單位、無出版時間，但明確收錄了毛澤東1962至1967年間的歷次重要談話。
- ②⑥ 孫立平：《轉型與斷裂：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頁30。
- ②⑨ 宗鳳鳴記述：《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香港：開放出版社，2007)，頁170。
- ③⑩ 格里德爾(Jerome B. Grieder)著，單正平譯：《知識份子與現代中國》(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頁392。
- ③⑪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6-1920.11)(長沙：湖南出版社，1995)，頁554。
- ③⑫ 費正清(John K. Fairbank)著，陸惠勤等譯：《費正清對華回憶錄》(上海：知識出版社，1991)，頁336。
- ③⑬⑭ 何方：《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下冊(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頁438-39；439、451。
- ③⑮⑯ 李志民：〈抗大抗大·越抗越大〉，載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七輯(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3)，頁52-53；24-95。
- ③⑰ 1927至1937年，高等教育與中等教育均成倍增長，學校數量與學生數量翻倍，其中師範學校幾達1927年的3倍。1930年代初，河南幾乎每縣均有一所師範學校，山東、甘肅的師範學校佔中等教育二分之一。參見叢小平：〈通向鄉村革命的橋樑：三十年代地方師範學校與中國共產主義的轉型〉，《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6年8月號，頁40。
- ③⑱ 徐鑄成：《徐鑄成回憶錄》(北京：三聯書店，1998)，頁15。
- ③⑲ 叢小平：〈通向鄉村革命的橋樑〉，頁38-51。
- ③⑳ 朱鴻召：《延安文人》(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頁106。
- ㉑ 李慎之：〈革命壓倒民主——《歷史的先聲》序〉，參見《李慎之文集》，自印本，上冊，頁150。
- ㉒ 馬畏安：《高崗、饒漱石事件始末》(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頁168。
- ㉓ 《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179。
- ㉔②⑥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冊(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頁411-12；408。
- ㉕ 如抗大課程為：辯證法、列寧主義、中國革命史、統一戰線理論、日本帝國主義分析、游擊戰、軍事訓練戰術，外加中共領袖們的專題演講。參見威爾斯：《續西行漫記》，頁76。
- ㉖ 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頁88。
- ㉗ 陸石：〈劫後重逢〉，載王蒙、袁鷹主編：《憶周揚》(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頁478。
- ㉘ 本刊記者：〈晚年陳雲與鄧小平：心心相通——訪國家安全部部長、原陳雲同志秘書許永躍〉，《百年潮》，2006年第3期，頁15。
- ㉙ 白樺：〈暴風中的蘆葦〉，載金薔薇編：《作家人生檔案》，上冊(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01)，頁102。
- ㉚ 趙復三：〈總結五四經驗·開闢歷史道路〉，《明報月刊》，2006年5月號，頁57。
- ㉛ 李銳：〈懷念田家英〉，參見董邊等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頁146。
- ㉜ 李銳：《〈中共創始人訪談錄〉序》，參見王來棣採編：《中共創始人訪談錄》(香港：明鏡出版社，2008)，頁10-11。《炎黃春秋》2008年第8期刊載此文，刪去「同人類文明背道而馳」與涉及「六四」兩句，頁44。